

抗战时期陇东根据地农村副业发展研究

——以纺织业为主的考察

王 飞

(历史与地理学院 陇东学院, 甘肃 庆阳 745000)

【摘要】抗战时期陇东根据地的纺织业在党的领导及政策支持下迅速发展,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半自给到自给的发展过程。通过政府投资公营纺织业,完善合作社股权制,帮扶个体手工业,鼓励私人资本投资等多种方式,形成了以公营经济为骨干,合作经济为补充,个体手工和私营经济协同共进的发展新机制,成为边区纺织业发展的典范。纺织业发展既呈现出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又有浓厚的公权色彩,尤其是边区高干会议后,政府权力全面介入合营、私营纺织业之中,成为陇东纺织业发展的突出特点。纺织业的繁荣发展不仅保障了军民自给,支持了长期抗战,而且改变了陇东农业经济的单调局面,引发了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更为重要的是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积累了成功的、丰富的建设经验。

【关键词】农村副业;纺织业;陇东根据地;抗战时期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1-0080-10

Research on Rural Secondary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Longdong Bas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 Inspection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WANG Fei

(School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Long Dong University, Qingyang 745000)

Abstract: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longdong base area developed rapidly under the leadership and policy of the part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realized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from semi-self-sufficiency to self-sufficiency from small to large. Through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the public textile industry, improving the equity system of cooperatives, helping individual handicrafts, and encouraging private capital investment, a new development mechanism has been formed that takes the public economy as its backbone, complements the cooperative economy,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handicrafts and the private economy in concert. Become a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the border are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not only presents the concept of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but also has a strong public power. Especially after the high-level meeting in the border area, the government's power has been fully involved in the joint venture and the private textile industry, which has become a prominent fea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Longdong.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not only guaranteed the self-sufficiency of the military and the people, supported the long-term war of resistance, but also changed the single economic base of the rural areas in Longdong,

[收稿日期] 2019-10-11

[基金项目] 陇东学院博士基金项目(XYBY1911);甘肃省2019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抗战时期陇东根据地经济社会变迁”(19YB133)

[作者简介] 王飞(1981-),男,历史学博士,陇东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史。

triggered the adjust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planting structure, and more importantly, accumulated successful and rich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for the new-democratic economy.

Keywords: rural sideline; textile industry; Longdong Bas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抗战时期,纺织业是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农村副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边区农产品加工的主要业态。随着边区人口的大量增加,解决边区机关、部队、学校及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纺织业被赋予经济、政治等多重含义,被党中央及边区政府高度重视。

目前,学界对边区纺织业研究成果较多^①,但作为边区重要组成部分的陇东根据地,其农村副业发展极少受到学者关注^②,更遑论纺织业了。鉴于此,笔者根据《陇东分区部分县农副业调查》^③《合水县政府1942年上半年总结工作报告》^④及《合水县十七个月的工作报告》^⑤三份档案,并结合其它相关文献,对其进行尝试性研究,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

一、边区政府对纺织业发展的政策扶持

陕甘宁边区是在乡村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生产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品完全依赖边区以外供给。直至工农红军到达陕北,才开始有“小规模军事修械厂、印刷厂等”^⑥。1935年区内仅有一个40余名工人的修械所,加上被服、印刷等工厂,也不过270余名职工^⑦。

陇东根据地“农村家庭纺织业也因外来纱布的大量涌入而销声匿迹”^⑧。“人民不懂纺织,除粮食、羊毛外,其它一切日用所需,从棉布到针线,甚至吃饭的碗均靠外来。”^⑨抗战爆发后,作为边区的西大门,陇东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负有守卫边区安全、保障边区物资供给的重大职责。陇东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纺织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纺织品类齐全,包括衣、帽、袜、被、手套等,生产方式由手工生产逐步发展到半机器生产。纺织产品不仅做到陇东军民的自给,还有力支援边区经济建设,为抗战胜利作出卓越的贡献。

抗战爆发后,为充实抗战力量及战争供给,1938年边区政府提出工业建设的任务:“普遍地发展手工业和半机器手工业,以现有的各手工业为主,发展推广到边区农村中,建立私营、公营、合股合作等手

① 主要以闫庆生《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纺织业》,《甘肃高师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曹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纺织工业》,《纺织学报》2006年第9期;王晋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工业》,《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等为代表。

② 目前,所能见到的成果如王飞:《抗战时期陇东根据地畜牧业发展研究》,《中国农史》2019年第3期;其它的如中共庆阳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经济建设》(内部资料1996年)中有部分史料涉及。

③ 陕西省档案馆藏,卷宗234。

④ 庆阳市档案馆藏,卷宗243。

⑤ 庆阳市档案馆藏,卷宗209。

⑥ 《关于边区经济建设之报告书》(1941年10月4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3页。

⑦ 《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1944年6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3页。

⑧ 《边区工业的发展》,《解放日报》1944年5月1日第2版。

⑨ 《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1947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页。

工业与家庭手工业,广制土布,求得足够供给民众自用。”^①

1939年,国共摩擦加剧,棉纱、布匹及各种生活日用品成为国民党封锁边区的重点物资。为打破封锁,实现布匹自给,同年10月,边区政府确立发展纺织业“生产合作社,以求得战时工业品的自给自足。”^②但因纺织业基础弱、底子薄,直到1939年底,边区只有“公营纺纱厂1家,织机23架,年产大布1426匹;纺织合作社2家,织机8架,年产大布400匹;私营纺织厂6家,织机52架,年产大布3690匹。”^③这与边区衣被需求有非常大的差距。边区盛产羊毛,年产约达500万公斤,是解决服装被褥的重要原料^④。为此,1940年9月,朱德总司令号召立足边区,开展纺织运动。学校、部队和各机关均开始建设属于自己的毛纺工厂,纺毛线大规模开展起来。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实施更严厉的经济封锁。广泛开展经济建设,把边区经济由半自给状态提高到完全自给,以支援战争、保障民生,不仅是首要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边区政府在1941年1月制定了《陕甘宁边区三十年经济建设计划》,对纺织业做出部署:“正在筹备或已经成立之23个纺织合作社及各地纺织厂,以织布为主,政府大量收集羊毛与棉花,并广泛发动妇女纺纱,供给各合作社与工厂所用。发动机关人员纺纱,以供其生产,提高生产量,求得1941年最低限度能出产布14000匹,毛呢3000匹,毛毯20000床。”^⑤自此,纺毛、纺织成为边区各单位、乡村群众日常性、经常性的政治任务。

在党中央及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加上各类政策的扶持,到1941年10月,边区有各类纺织厂(社)70个,纺织工人学徒2029名,资金2479362.79元;纺纱机计有铁机57架,手拉机483架,抛梭机49架,弹机32架,织机337架,毯机93架,其他40架;月纺纱6487斤,织布3663匹,织毯696床,弹毛1707斤^⑥,但与边区布匹需求仍有很大差距。

1942年11月23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在《对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中规定:“政府以投资贷款或是与民公营的方式,参与到民间手工业发展中去,特别是纺织。”^⑦《指示》颁布标志着政府投资力度加大,除了布局公营纺织业之外,更要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私营纺织业中,以扩大纺织业生产,保障军民供给。同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对边区工业发展情况做详细总结。他指出,经过5年的努力,边区工业已经打下初步的基础,起到“保障供给、调节物价的作用”,但纺织工业和被服工业,离自给还有一定差距,截止到1942年,“纺织厂已能产布22000余匹,但是我们需要量是4万至5万匹,尚需做极大努力才能达到自给。”为此,纺织业必须实行:“提高布匹进口税;普遍倡导妇女纺棉或纺毛;解决供销问题。”提高布匹进口税意在“保护区内土布”,同时规定“部队及机关学校要一律采用边区出产的土布”;动员纺棉或纺毛的目的是保证“工厂毛线、纱线原料的供给和增加群众的收入。”^⑧

① 刘景范:《一九三八年边区经济建设报告》(1938年11月5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② 《陕甘宁边区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1939年10月30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42页。

③ 《边区工业的发展》,《解放日报》,1944年5月1日第2版。

④ 边区畜牧业发展及羊毛产量,详见王飞:《抗战时期陇东根据地畜牧业发展研究》,《中国农史》2019年第3期。

⑤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56页。

⑥ 这个产量统计并不包括机关经营的三边纺织厂、新正纺织厂、新华染织厂、三八五旅纺织厂、三五九旅纺织厂的产量和私营的清涧丝织厂、庆阳黎明纺织厂、清涧五纺织厂的产量。见《边区工业概况》(1941年10月23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38页。

⑦ 《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对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1942年11月23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9页。

⑧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第817-823页。

边区政府根据毛泽东对纺织业情况的总结,并结合实际,制定了1943年边区纺织业发展计划:“争取1944年公用布匹的完全自给,要坚持充实并扩大纺织厂,从而增加布匹产量;同时改善毛织品,制定关于布匹与缝制的标准,保证目标计划的有效实施,确保棉衣与被褥的耐用性。”^①

高干会议前的几年内,边区公营工业生产基本上是盲目生产,政府缺乏应有的监管,出现布匹质量参差不齐状况。高干会议上对棉纺织制品提出缝制标准。会议要求棉纺织制品不仅要确保产量,还要提高质量。高干会议以后,党和政府对于纺织业生产此前就已规定的“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开始重新受到关注和重视。边区纺织业进入统一、有计划的经营时期。

二、陇东根据地纺织业的发展类型

陇东根据地纺织业在党的领导下,党政军民齐动手,公营、私营和个体经营协同共进,纺织业规模逐步扩大,纺织品类齐全,不仅做到自给,还有效供给边区,支援边区建设。

(一)公营纺织业

陇东根据地的公营工业起步晚,最早的公营工业是1938年由中共陇东特委、庆环分区专署和保安司令部联合出资成立的救亡纺织厂,这是陇东根据地公营工业的开始。1940年庆阳县成立利民纺织厂,曲子县成立纺织生产合作社,1941年三八五旅成立“益华工厂”等。这些纺织工厂成为陇东根据地创办的最早的一批公营纺织厂,奠定了陇东根据地纺织业发展基础,推动了纺织业的快速发展。

为克服经济困难,在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的同时,中共陇东根据地加强对原有公营工厂的领导,并充分发动民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采取集资、入股、贷款等办法支持发展纺织业,一批公营纺织厂陆续建起,并逐步形成规模。1941年10月《解放日报》专题报道陇东根据地纺织工厂的情况:“救亡工厂,拥有股金3.5万元,向边区银行贷款2万元,土造织布机5架,织毛巾、织袜机各2架,纺纱机6架,每月织布100匹,织袜子90打;利民工厂有资金7700元,借款5000元,织褥子布机1架,出品有毛褥子布、毛毡、绒鞋等;克己工厂有资金600元,向银行借款5000元,织褥子布机2架,制毡工具1套,线用手捻,每月制毡130余条,织褥子布4匹。此外,还有口袋工厂,资金5000元,土造工具3付,每月织口袋150余条,今年赚净利1500元。”^②这些公营纺织厂不仅实现了本单位布匹自给,而且出现了部分剩余。剩余产品的出售,基本上满足了群众需求,一定程度上调剂了棉纺市场、平抑了布价。

为解决资金短缺,陇东根据地纺织业积极吸收政府投资,大力招股融资。“曲子县生产合作社股金3500元,华池县生产合作社股金4100元,环县生产合作社股金12900元。合水县拟办生产合作工厂,已集股1800元”^③,招股融资创新了融资渠道,扩大了资金来源,为纺织业快速发展奠定了资金基础。

1942年,边区中央局《对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颁布后,政府从政策、资金及原料方面对纺织业给与支持。陇东根据地公营纺织业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发展规模迅速壮大,纺织品类日益齐全,成为边区公营纺织业的典范。

表 1		陇东根据地各公营纺织厂情况统计表									
厂名 项目		救亡	克己	利民	合水	镇原	华池	曲合社	环县	毛口袋厂	合计
资 基金		35000	600	7700	1700		2000	3526	8506	2300	61332
金 贷款		20000	5000	5000	2400	3500	6000	1500		4000	47400

①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23页。

② 《陇东分区开办工厂十余处》,《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3日第4版。

③ 《陇东分区开办工厂十余处》,《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3日第4版。

共计	55000	5600	12700	4100	3500	8000	5026	8506	6300	108732
工人	22	20	14	5	6	10	13	8	7	107
织布机	5		3	5	1	2				16
织 机		3	1				1	1		6
弹花机	1									1
织毛机			8	1	5	13		5		32
手摇机	6	25		4	5	6		2		48
织袜机	2									2
织毯机		一套								
大 布	214匹	120							280	
老 布	679匹					360				
袜 子		120			460		2046			
毛毯子										
毡 鞋		1423	2100							
毡 帽	219	355	820							
开始时间	1938	1941	1940	1941	1941	1941	1941	1941		
停止时间	继开	继开		1942	1942	1942	1941	1942	继开	
主办者	地委	保安科		县政府	县政府	县政府		县政府	分区后援会	

资料来源:《陇东、绥德纺织业发展情况》(估计1942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54页。

为了提升纺织效率,扩大工厂规模,1943年,救亡工厂和利民工厂合并为“联合工厂”。合并后的联合工厂是陇东根据地最大的公营纺织厂。1944年7月,《解放日报》对联合纺织厂进行报道:“至今年7月,现已开动机器有织布铁机4架,木机17架,毯机2架,裁毯机1架,毛巾机1架,打袜机1架;未开动的铁机5架;打袜机2架,纺纱机18架;另备有木机材料20多架;每月可产棉老布300余匹,毛毯160余条,毛巾50余打,袜子70余打,布鞋2000双,毛毡1000条;原料除棉花向外购买外,羊毛、纺纱当地皆可解决……赶明年计划产布1.2万匹,一定要做到供给整个三八五旅及地方党政机关人员衣服之半数。”

总之,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陇东根据地积极贯彻落实边区政府关于公营纺织业发展政策,并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条件,主动作为,使陇东公营纺纱业迅速发展起来。1945年底,陇东根据地公营纺织工厂达到28个,有职工1000余人。公营纺织工业成为陇东根据地工业的骨干,成为边区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边区工业经济发展、军民衣被保障供给及抗战胜利做出巨大贡献。

(二) 纺织生产合作社

为了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解决农村人口穿衣问题,陇东根据地大力倡导纺织生产合作社^①,广泛动员妇女参加纺纱、纺毛合作社,以保障工厂的纱线、毛线的供给。农村的毛纺、毛织是陇东根据地农村副业的支柱,是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主要手段之一。

① 纺织生产合作社一般以乡为单位,每乡组织一社,凡是住在那一乡的妇女,不论成年老年或女娃,只要她会纺纱,或愿意学习纺纱、织布,都动员她参加纺织生产合作社,把她们以自然村编成小组,每组三人以上,每组选组长一名,负责本组的责任。参加合作社的社员缴纳股金,股金主要用于购买棉花、纺车、羊毛供应社员纺织,社员所生产的毛线、棉纱或布匹除了自用外(自用部分抵消工资后,按照较低市价购入),其余一律交给合作社整体外销,或交给公营工厂织布,不得私自向外出售。每县有两个纺纱合作社组织成立后并开始纺纱后,就应该联合起来进行织布生产。见陕甘宁边区建设厅:《生产合作社组织办法纲要》(1940),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366页。

纺织生产合作社是动员农村妇女利用农闲进行生产的组织形式。每个纺织合作社有若干个纺织小组。1940年“庆阳、曲子、镇原三县统计农村纺织妇女为1042人,1941年有2054人”,至1942年“全分区6个县有纺织妇女4427人”。“合水1942年共纺线34039斤,织布18756丈,一匹4丈,共合4689匹。”^①“1943年,庆阳、合水、镇原三县共有纺妇6598人,纺车5888架,共纺线23230斤,织布32452丈。赤城区纺织业发展最快,有327名纺织妇女,纺车282架,1943年纺线11020斤,织布15896丈,占三县纺织总数1.5倍以上。”^②

纺织小组是纺织生产合作社基层组织形式。每个小组最少3人,最多20人进行集体生产,以小组的形式组织起来便于管理,有利于提高纺织效率。如“庆阳县卅里铺区冯家嘴庄组织了14人的妇女纺织小组,每年可织布匹120匹,除供本村需要(全村每年需布50匹)外,尚余70匹。”^③1944年,镇原县孟坝区“二乡的162户农民中,有纺车172把,织布机78架,纺妇和织妇都参加了纺织小组。全乡自纺自织产布1978丈,除自用908丈外,出售1070丈,这只是半年的统计,下半年她们计划扩大生产,再织3648丈。该乡三行政村一个自然村,全村9户人家,去年有纺车10把,而今年则达14把,去年6家织布,今年有9家,去年全年从外边买进了36丈布,而今年半年已向外卖布164丈。”^④

陇东根据地农村小户大都参加了纺织生产合作社,尤其是家小业薄者,从合作社领取原料或生产工具,在家纺线或织布,成品交合作社统一经销。如《解放日报》报道:“在本月9日至19日十天内,就有56家妇女在该厂领取棉花200余斤。其中有好几家已经是第三次领花纺线了。高迎区及赤城区政府代妇女领取棉花100多斤。很多妇女每三天可纺1斤纱,庆城西街有个妇女在9天内纺了3.14斤纱。”^⑤合作社纺织生产形式灵活,农户无需成本,且多在农暇之际进行,不占用农业生产时间,不脱离家庭,受到乡村纺妇、织妇的普遍欢迎,成为公营纺织业的重要补充,是陇东群众衣被自给的主要来源。

(三)个体纺织业

陇东根据地个体纺织业大都是家底相对殷实,有资金购置生产资料的大户家庭。个体纺织业基本上是自发的、散漫的家庭小生产,有些家庭自织自穿或自卖,有些向合作社或公营纺织厂领花纺线挣工资,绝大多数属于前者。

1940年以前,陇东根据地个体纺织业处于自流的状态,政府对个体纺织业缺乏统一领导,缺乏适当的调剂、供销。《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对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颁布后,个体纺织业在党政军民帮助下,开始走上正轨,开始有计划地生产销售。

陇东个体纺织业在党的政策扶持下有了快速发展,但还存在具体困难,如“工具缺乏,原料困难,销售无门,工厂的工资太低等,不能很好地解决。”^⑥为此,边区政府组织开展了纺织合作社帮助自纺自织等家庭手工业者。采取了放花收纱,挣花工资形式解决纺妇的原料困难,领一斤一两花,按纱的质量好坏,挣花工资8两到12两;放花收纱,挣米工资,纺一斤上等纱挣米工资四升,中等纱三升,三等纱二升;还有如用棉花换布、买纱卖花等方式帮助自纺自织者。

① 刘凤阁:《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经济建设》(内部资料),1996年,第250页。

② 《庆阳合水镇原三县纺线两万斤织布三万丈》,《解放日报》1943年6月28日第2版。

③ 《庆阳发现纺织模范村冯家嘴庄织一余一》,《解放日报》1944年8月28日第2版。

④ 《镇原县孟坝区第二乡纺织发达自给有余》,《解放日报》1944年8月14日第2版。

⑤ 《庆阳妇女积极领花织布》,《解放日报》1943年3月23日第2版。

⑥ 《陇东绥德纺织业发展情况》(1943),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448页。

表2 1944年陇东分区自纺自织情况统计

	纺妇(人)	纺车(架)	纺纱(斤)	织妇(人)	织机(架)	织布(大匹)
陇东分区	2871	11513	32238	3013	3032	2718

资料来源:《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427页。

与个体纺织业相关的还有手工制毡业,毡坊是陇东根据地农村副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合水从事个体纺织业有46人,皮匠13人,皮坊5处,染坊5个,毡匠15人^①。到1944年,庆阳市有私人独立经营的与纺毛相关的毡坊、毛毡子坊、染坊60多家,促进了纺织衍生业的发展。

表3 1944年陇东根据地手工作坊统计表

类别	毡房	口袋坊	皮坊	裁缝	染坑	毛合子坊	合计
户人数							
家数	10	14	18	5	32	8	87
人数	50	28	40	15	71	28	232

资料来源:本表依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简述》(1948年2月19日)资料编制。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456页。

陇东根据地个体纺织业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变工等多种形式获得蓬勃发展,并涌现出诸多典型,成为边区的纺织模范。个体纺织业的发展是增加陇东根据地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生活和穿衣结构的主要手段,是活跃陇东农村经济的重要力量。个体纺织业的发展实现了农村家庭衣被自给,促进了乡村妇女观念改变,成为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有效手段。

(四)地主、商人投资的私营纺织业

抗战时期,陇东根据地由地主、商人投资的私营纺织工厂数量少,发展缓慢。代表性的是民生纺织厂,由梁鸿桂投资兴办,有纺纱机1架,织布机2架,纺线机每天可纺3斤,织布机每架每天织布4丈;庆兴纺织厂是由庆阳县刘宪庭等5个私人股东和3个机关股东合资创办的,有资金1.3万元。生产组织由经理负责,经理以下设工务、会计、保管三个组。有织布机7架,轧花机2架,最近拟添置纺线机数架。线主要靠厂外的纺户供给^②。其他的还有庆阳市商务会副会长张守安“决定集资办纺织工厂,请木匠做机器,计划不久即可开工。同时,又向庆市商界招股,闻任绍亭先生拟以巨款投入。”^③

陇东根据地私营纺织业成分虽然不大,但也是陇东根据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活跃纺织业经济的重要力量,对公营、家庭手工业及作坊经济起到有益的补充。

三、陇东根据地纺织业发展的经验与不足

陇东根据地在边区政府领导和政策的支持下,结合本区实际,因地制宜地保护与扶持纺织业发展,促进了纺织业的快速发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边区经济建设。陇东根据地纺织业快速发展为边区纺织业积累了诸多经验。

(一)大力解决纺织业原料

棉花、羊毛是发展纺织业的基础。抗战时期,陇东根据地采取各种措施保障纺织业原料的供给:一

①《合水县十七个月的工作报告》,卷宗209,庆阳市档案馆藏。

②《庆阳绅商梁鸿桂刘宪庭转向工业办纺织厂》,《解放日报》1945年6月2日第2版。

③《庆阳市商务会副会长张守安先生投资举办纺织厂》,《解放日报》1945年2月8日第2版。

方面由贸易公司或合作社调剂纺织原料、生产工具。由于自织自纺的家庭纺织业成本少,范围小,遇到棉花缺乏、布匹滞销时,就不能继续生产。为此,1942年边区工业建设计划中特别强调“政府应在原料与生产工具之调剂上予以各种便利和帮助。公营纺织业应尽可能与他们的生产取得密切配合与联系”^①,以扶持自给自足的家庭纺织业。另一方面政府有计划地推广植棉。

表4 1943年陇东根据地棉地分布及产量

地区	面积(亩)	总产量(斤)	平均每亩产量(斤)
庆阳	304.00	57048(3040)	10
合水	405.80	4050	10
曲子	31.50	415(315)	10
合计	741.30	7413	10

说明:括号内的数字为编者校正后的数字。

资料来源:《边区农业统计表(1940-1943)》(1944),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70页。

1941年,在边区政府的号召下,陇东根据地“发动群众广种棉花,印制植棉小册子,派人指导,发放棉花贷款,奖励植棉织布,植棉地三年不纳公粮,赔偿植棉损失,帮助解决籽种、农具、耕畜等困难,改进栽培技术。棉花种植面积扩大。棉花产量合水最高,每亩可净收棉花30斤,其他地区亩产15-20斤。”^②同时,陇东根据地的贸易公司、食盐公司通过各种关系,购买棉花以解决棉花短缺问题。

(二)注重典型示范

陇东根据地党委和政府非常重视树立典型,对纺织业涌现的典型,积极宣传,发挥模范带头作用。1944年8月的《解放日报》对庆阳县蔡德旺家进行报道:“全家69口人,8名家庭妇女都会纺线织布。家有7把纺车、3架织布机。他家的纺线带动了全庄,庄里5户妇女都学会了纺线织布,出现了一人带全家,一家带全庄的喜人景象。”^③陇东根据地个体纺织业最为典型的是合水县黄生秀的纺织形式,成为边区政府积极倡导、推广的个体纺织典型。边区主办的《中国妇女》杂志以《合水黄生秀的纺织形式》为题,系统地介绍了黄生秀的纺织经验:“从1943年7月开始,他买了四架织布机,与周围14个纺织户挂钩,采取‘发花收纱,自己织布’的办法,成为织布专业户,四架织机做到全村穿衣自给,且有剩余出卖。”他与纺妇之间采取“工资关系^④,纺织变工^⑤,给工资代织布^⑥”^⑦等三种方式,调动纺妇的积极性,维护双方的利益。黄生秀自织自卖,不但自己富起来,还带动周围纺户找到了致富门路,1944年他被县上树立为纺织英雄。

(三)发放纺织贷款

为了支持纺织发展,边区银行陇东分行对纺织工厂、生产合作社及家庭自织自纺者给与贷款,解决

①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1942年度边区经济财政建设的决定》(1941年12月25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② 《陇东分区部分县农副业调查》(1945年),卷宗234,陕西省档案馆藏。

③ 《庆阳蔡德旺家团结和谐勤劳生产》,《解放日报》1944年8月9日第2版。

④ 工资关系即1斤花交纱15两(当时每斤为16两),给工资法币80元。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450页。

⑤ 纺织变工是在纺户需要时采用,织一个布(需一个半工)变纺两斤半花(八个工),合一个织工变五个半纺工。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450页。

⑥ 给工资代织布即织一匹布工资边币1700元(带有义务成分,较市价低425元)。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450页。

⑦ 《合水黄生秀的纺织形式》(1945年1月),《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中国妇女社,1946年,第42-48页。

资金问题。1941年,陇东分行向庆阳“利民工厂贷款5000元,克己工厂贷款5000元,向曲子县生产合作社贷款1500元,向华池县保安科创办的工厂贷款2000元,环县生产合作社贷款1500元,合水县生产合作社700元。”^①联合纺织厂1944年获得陇东分区财委投资700万元^②。1944年10月陇东分行“以3300万元纺织贷款分发分区各县。帮助较穷农户建立纺织设施,购买工具;为已有纺织基础的纺妇解决一部分棉花。”^③纺织业生产合作社在争取银行贷款外,还主动吸纳社会资金入股,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如合水县1941年纺织合作社吸收“股金5122.5元,盈利450元。”^④1942年,合水一区纺织合作社吸收“股金27297元,五月净利4267.6元”,二区吸收“股金7556.85元,净利6200.95元。”^⑤

尽管陇东根据地纺织业发展取得诸多成效,积累较为丰富的经验,但仍然存在不足。首先,对纺织业认识上存在偏差。抗战以来,陇东根据地纺织与绥德、延属分区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陇东根据地内部发展不平衡,庆阳、合水、华池纺织业发达,而镇原县、曲子和环县发展缓慢,这除了区域环境的限制外,还与领导的认识、重视程度有很大的关系。环县虽不产棉花,但环县畜牧业发达,对本地羊毛的发展却不重视。普遍认为手工业、副业发展慢,收入少,不如商业来钱快;其次是流通环节不畅,布价纱价较低,引起人们不满。尤其是家庭手工业,曾出现“纺了线没处卖,卖给合作社不要,卖给工厂不够本钱。工厂的资本太少,没有钱贴,只有在棉花和工资上扣得很紧,工钱欠得很久不给纺户。因此,引起了许多纺妇的不满”^⑥;再次,公营工厂管理不善,政府对家庭纺织业技术指导不够,缺乏统一的规划,曾造成纺织布匹质量参差不齐。

四、结 语

抗战爆发后,随着边区人口的增加尤其是非生产性人员的激增,衣被供需存在很大差距。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实施全面封锁,严禁布匹、棉花等物品输入边区。保障军民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穿衣成为头等重要的事情。发展毫无基础的纺织业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艰巨任务。党中央必须重新布局纺织业发展,并出台一系列政策加以扶持。

陇东根据地主动抓住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发展纺织业的利好政策,从满足本地军民穿衣自给的目标出发,充分利用本地畜牧业发展的优势^⑦,推广植棉,动员纺妇、织妇参与生产,扩大毛、棉的产量,积极创办公营、合营纺织业,资助个体家庭纺织业,鼓励支持地主、商人投资兴办资本主义纺织厂等多种经营方式,使陇东根据地纺织业快速发展起来,工厂数量不断增长,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纺织品类齐全,成为边区纺织业发展的典范。

(一)纺织业快速发展,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

从1938年救亡纺织厂开始,到1941年10月,陇东根据地公营纺织工厂发展为二十多个。这些工厂的产品质量逐步提高,产量也逐渐增多,基本满足了军队和机关的需求。农村自纺自织的家庭纺织业发展迅猛。有些农户、村,甚至部分纺织基础较差的乡已达到了穿衣自给,如毫无纺织基础的环县“1943年已有226个妇女学会纺线,纺车197架。洪德区三乡四村韩青云的女儿纺线,不但够自己家用,还能卖

①《陇东分区开办工厂十余处》,《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3日第4版。

②700万元是边区为解决联合纺织厂原料短缺,以边区政府统收的羊毛,按照市价计算而来。

③《边区银行陇东分区发放纺织贷款三千余万元》,《解放日报》1944年10月8日第2版。

④《合水县十七个月的工作报告》,卷宗209,庆阳市档案馆藏。

⑤《合水县政府1942年上半年总结工作报告》,卷宗243,庆阳市档案馆藏。

⑥《陇东绥德纺织业发展情况》(1943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448页。

⑦王飞:《抗战时期陇东根据地畜牧业发展研究》,《中国农史》2019年第3期。

一部分。高迎区三行政村村主任纺线织布,保证了全家每人每年两套单衣,一套棉衣。”^①庆阳在“1940年前只有1家毡坊,到1943年共有公私毡坊10家,每天产毛毡50多条,成为庆阳手工业中一宗最大的收入。1943年庆阳的联合工厂有“毡机2架,裁毡机1架,打袜机3架;可产毛褐子(宽的2.6尺,窄的1.5尺)、毛毯、裁毯、袜子、绒毛毡、布鞋、绒鞋、保险皮底鞋等。年产毛毯1920余条,毛袜子840打,毛毡1.2万条。做到供给整个三八五旅及地方党政机关人员衣服之半数。”^②截止到1943年,庆阳县有纺织妇女1961名,纺车1920台,织布机378架,每一织布机平均织布50丈,全县378架织布机织布19000多丈^③。新宁县发展妇纺“有的村庄除全部自给外还有剩余。五区四乡辛家沟圈的8户人,给军队织裹腿带24丈,除穿衣自给外,还余49丈。”^④陇东分区的“合水、环县和庆阳合计产羊毛28770斤,价值431560元。”^⑤群众“大都靠此解决穿衣和家庭零用开支。”^⑥当时驻扎在陇东的留守兵团自1940年以来,实现了“夏天有单衣,冬天有棉衣,人人有被褥。”^⑦陇东分区专署警卫队“发夏衣两套,衬衣一套。”^⑧

(二)积累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经验

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基础,新民主主义经济代表着各革命阶层的经济利益,是一种特殊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形式。它既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又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还有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等多种经济并存的经济形态;抗战时期,陇东根据地在发展纺织业的过程中,积累了发展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宝贵经验。创造性地实施工厂企业化,公私两利的制度,建立了工厂核算制,并逐步推行了津贴制,计件工资制,改变了吃公粮用公款的机关模式。如1940年陇东根据地“工人工资比1937年增加20%~25%,实施10小时工作制”^⑨。新制度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鼓励了纺织业的发展,使陇东分区涌现出很多的纺织模范家庭、模范村。纺织业成为陇东根据地农村家庭副业的主要业态。

总之,陇东根据地纺织业迅猛发展不但保障军民自给,提高党政军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改变陇东农业种植结构,棉花种植史无前例地得到认可并推广,促使陇东农村个体手工业蓬勃发展起来。陇东家庭纺织业成为边区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边区工业经济的发展、军民衣被供给保障及抗战最后胜利做出卓越的贡献。

杂志社版权页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社上述声明。

①《庆阳合水镇原三县纺线两万斤织布三万丈》,《解放日报》1943年6月28日第2版。

②刘凤阁:《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经济建设》(内部资料),1996年,第28页。

③《发展庆阳家庭纺织业》,《解放日报》1943年3月30日第2版。

④《新宁县发展纺织已能自给穿布三分之一还要努力提倡自给织布》,《解放日报》1945年1月9日第2版。

⑤王晋林:《论边区政府发展畜牧生产的政策与实施》,《传承》2013年第11期。

⑥《志丹牲畜死亡率甚大》,《解放日报》1944年9月26日第2版。

⑦刘凤阁:《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经济建设》(内部资料),1996年,第393页。

⑧《庆阳农民帮助警卫队秋收,陇中自种菜蔬可吃到明年四月》,《解放日报》1943年1月26日第2版。

⑨刘凤阁:《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经济建设》(内部资料),1996年,第82页。